

北方漁獵民族考

王咏曦



齐齐哈尔社会科学杂志社

胡绍增
张振华

主 编

齐齐哈尔社会科学杂志社

一九九〇年一月

王咏曦 著

北方渔猎民族丛考

嫩江盛开学术花

张泰湘

我的好朋友、王咏曦同志的文集——《北方渔猎民族丛考》，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问世了！咏曦同志嘱我写一篇序言，我自愧不敢承担，因为咏曦同志年龄还长我一岁，在学术上已是硕果累累、名震嫩江两岸的乡土史学家了。他让我写序，实在是高抬了。但在他挚诚的请求下，我只得欣然命笔，略说一、二了。

我认识咏曦同志已有七、八年了，通过在工作中的多次接触，才逐渐了解到他本是学测绘的，现在主抓县里的侨务工作，这和史学本无缘份，但由于他热爱嫩江两岸的历史，热爱嫩江两岸的各族人民，热爱嫩江两岸的黑土地，利用业余时间发愤读书，翻阅史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终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几年来，在省内外的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引起了省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与瞩目，是近年龙江史苑中涌现出有成就的中年学者之一。

咏曦同志做学问除了刻苦学习、勤奋耕耘之外，还能够发扬家乡的优势。他生活、工作在讷河。讷河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生活的地方，他利用这一优势，长年深入鄂温克村落，实地考察鄂温克、鄂伦春人的生活习

俗、民族历史，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取得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发前人之未发，填补了嫩江流域民族史和民族学研究中的许多空白。

在当前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有些人视学问为无用，视知识为草芥，他们为眼前利益所诱惑，从而弃学经商，弃政经商，而咏曦同志却能够逆流而勇进，不为时尚所迷惑、不为偏见所左右，利用业余时间，潜心钻研，奋发著述，继乡人郭克兴之后，接前人吕光天之棒，为繁荣龙江的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为嫩江流域各族人民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我相信，百年之后，党和人民会记住他的。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目 录

序言 嫩江盛开学术花.....	张泰湘
达斡尔族源流考.....	(1)
从民俗论 ^{达斡} 达尔族源于契丹.....	(8)
清代达斡尔族中的郭博勒氏.....	(17)
雅克萨人南迁与地名.....	(31)
北方渔猎民族居住地名称试析.....	(34)
清代布特哈的扎兰阿巴设置.....	(43)
鄂温克族史话.....	(66)
鄂温克族的崇拜信仰民俗.....	(71)
鄂温克人的生产与交易.....	(84)
鄂温克人的衣食住行.....	(110)
鄂温克人的节令与礼仪.....	(119)
鄂温克人的文化生活.....	(135)
鄂温克人的社会规范.....	(152)
嘎布卡村的鄂温克人古风民俗.....	(156)

鄂伦春与鄂温克族同源考..... (163)

发展生产力是改变鄂伦春族落后面貌的根本

保证..... (179)

奇三与齐齐哈尔楚勒罕贡貂案..... (191)

婉容和她的家族故里..... (197)

郭克兴与《黑龙江乡土录》..... (201)

孟定恭与《布特哈志略》..... (204)

盛京将军都兴阿..... (206)

作者后记..... (213)

达斡尔族源流考

达斡尔族是我们祖国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达斡尔”(Daur)是达斡尔族人的自称。汉语“达”为“从前”或“原来”之意，“斡尔”为“住处”之意，“达斡尔”合意为“原来住处的人”。达斡尔族人民有语言无文字，过去由于音译不同，在一些汉文的记载中，曾有达古尔、达呼尔、达瑚尔、达胡尔、达呼儿、达虎儿、打虎里、打虎力、达虎里、达瑚里、达呼里、达乌里、达古里、达乌尔等二十多种写法。“达斡尔”这一族称最早见于清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的《大清历朝实录》，满文曾被写作达霍尔、达库尔、达高尔、达奇鄂尔。解放后，国家尊重达斡尔族人民自己的意见，统一规定族称为“达斡尔”。

由于历史文献记载不多，给人们研究达斡尔族的源流问题造成很大困难，致使至今尚存在着一些争议。但是，近世纪以来，以原布特哈地区达斡尔族为主的一些民族学者，在对这一问题的学术讨论中，各执己据，坚持己说，热烈地开展了“百家争鸣”。西布特哈孟尔丁氏花灵阿著书《达斡尔索伦源流考》提出黑水国是其根源故地，东布特哈鄂嫩氏阿勒坦噶塔(今讷河县清和乡开阔沁人)依据《元朝秘史》，提出“蒙古各部之总称乃号达塔尔”，达斡尔人是达塔尔的遗

部。并说历史文献中曾记录有黑、白靺鞨，达斡尔人符合《蒙鞑备录》中的“所谓白靺鞨者，容貌稍细，为人恭谨而孝”的记述，为此，鄂氏著书《达古尔蒙古考》，力排众论，“以打倒一切混合别裔之诸学说”，而坚持达斡尔族为白靺鞨（又称熟靺鞨，为漠南的汪古部）的后裔，他说：

“达斡尔之民族性，徵证于书典之述载，非契丹之后裔，乃达塔儿之遗部也。”①他的同乡，德都勒氏吉尔嘎朗（汉名德古来，现任台湾立法委员）先生，也为其书作序主张此说。除上述之外，还有一些达斡尔族学者如西布特哈的孟定恭（字镜双）、东布特哈的郭克兴（克兴额）和一些地方志书如《黑龙江志稿》、《黑龙江外记》、《呼伦贝尔志略》、《黑水先民传》等，则主张达斡尔族是契丹人的后裔，“达斡尔”是由契丹族的“大贺氏”音转而来。以上各说均有自己的根据，但是，认真考其源流，笔者不敢苟同前两种说法，而取“契丹说”。下叙拙见，望求指正。

契丹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属于东胡族系，源出鲜卑，是鲜卑宇文部的别支。契丹部族大贺氏，发祥于今吉林省的洮儿河一带，这里在辽代受辖于泰州，后来成为契丹二十个部族的公有“放牧之地”，②泰州治所乐康（今洮安四家子古城址），辖地相当于现在的洮儿河上游地区，金承安二年（1197年）移置至长春州（今前郭县塔虎城），辖境扩至现在的洮儿河下游地区。“大贺”源于洮儿河名。唐代洮儿河称漏河，辽时谓塔鲁河或达鲁河，金时叫达古河，元时曰塔兀尔河或讨吾尔河。

“达斡尔”是“大贺氏”的对音。“尔”、“儿”、

“日”“里”在我国记载北方少数民族的书籍中经常混用，在达斡尔语中统意为“人”。

尽管历史记载不多，但毕竟还有记载，现摘录部分史籍中有关大贺氏的记载如下：

“契丹，居潢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在京城东北五千三百里。……逐猎往来，居无常处。其君长姓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旧唐书·北狄》）

“其君大贺氏，有胜兵四万，析八部，臣于突厥以为俟斤。”（《新唐书·契丹传》）

“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叶隆礼《契丹国志·并合部落》）

“大贺氏有胜兵四万，分为八部，北部皆号大人，内推一人为主，建旗鼓（按：旗鼓为标示部落联盟首领的象征）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旧五代史·契丹传》）

我国部分持“契丹说”的达斡尔族民族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以下论点和依据：

“达胡尔本契丹种，辽亡徙黑龙江北境，为打牲部落。”（魏毓兰《龙城旧闻》卷二）

“达胡尔，一作达呼里，又讹为打虎儿，契丹贵族，辽亡徙黑龙江北境与索伦部杂居于精奇里江。”（《黑龙江志稿·经政》）

“达虎里，一作达呼尔，又讹为打虎儿，本契丹贵族。”（黄维翰《黑水先民传》）

“所谓达呼尔或达虎里者，契丹盛时，中国人以其关外东胡人尊称曰大胡人，于是本族人亦以大胡人自称。契丹之君号因之曰大贺氏。至清注籍，以致音转字误也。”（孟定恭《布特哈志略》）

“唐时契丹君长为大贺氏，玄宗以后遥辇（一作约尼）氏继之，唐末始移于耶律氏。自是以后生齿日繁，逐渐迁徙，各部因所居之地著姓，仍以大贺为部族之号。……现在黑龙江各地方之达呼尔人，皆大贺之语转，已彰彰明矣。”（郭克兴《黑龙江乡土录》）

历史文献记载和学者们的著述证实达斡尔族源于古代契丹。

在清代布特哈打牲部落的达斡尔族人当中，流传着阿骨打灭辽以后，契丹的一些贵族，纷纷率领他们的家眷和部众，转至黑龙江和鄂嫩河一带的深山老林之中养精蓄锐，准备待机再返家园的传说，符合历史文献中关于契丹遗人库烈儿北迁的记载。另外，达斡尔人的祖先曾率部南征的传说也和库烈儿的孙子野仙投降成吉思汗并参加蒙古军南征金、宋战役的史实相符。同时，一些民谣如孟定恭在《布特哈志略》中搜集的“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泰州原野兮，吾之牧养场”也佐证了达斡尔族的祖先是来自契丹人居住的地方。

达斡尔语近似契丹语。“达斡”似是原契丹活动地区的“塔虎”或“达鲁”等地名的音转。达斡尔语中的哈日木乳（har muru）汉语为黑水（即今黑龙江），来源于契丹语的哈拉莫里（黑水）。“达斡尔语中的兔、鸟、乌鸦与契丹语

相同”，“马、山羊、蛇、狗等词源于契丹语”，“仲、冬、族等词的发音，达斡尔语与契丹语相同或相近”。③

除上述之外，达斡尔族与契丹人在生活风俗和习惯上，也有很多相同之处，从民俗而论，也可证明二者之间的源流关系。

这两个不同时代的民族，在体育活动中都喜爱打一种用牛毛做成的球，（达斡尔语称“贝阔”，即曲棍球），他们都信奉原始的萨满教。

“契丹族每当打仗行军之前，用艾蒿和马粪烧炙羊琵琶骨，炙破则出行，不破则不出。达斡尔族继承了祖先契丹的骨卜风俗。凡进山的狩猎组和伐木组，或出远门的人员，为了择定启程吉日，经常烧以兽畜肩胛骨，验其裂纹的顺逆，辨测吉凶，文理顺则出发，逆则缓行。”④

契丹族在狩猎生产中，针对各种野兽的习性，创造了不同的狩猎方法。根据“鹿性嗜咸，洒盐于地，以诱鹿射之。”⑤后来《辽史拾遗补》对这一记载又作进一步解释说“哨鹿之说，辽史已有之，但未详其法。今特志之：每岁于白露后三日，猎者衣鹿皮，戴鹿头，天未明，潜伏草中，吹木筒作声，牡鹿闻之，以为求其偶也，遂踊跃至；至，则利镞加焉，无得脱者。”⑥达斡尔族继承了这一经验，至今在外出狩猎时仍然“隐避等待，摸清野兽固定的路迹、饮水地方和聚集的地点。在那里需要几个钟头甚至几天，支好枪架，架好枪支，坚持等待。……引诱野物时撒些食饵和盐，或者吹口笛。较有代表性的口笛有狍笛和鹿笛两种。……鹿笛把白桦木片削光贴在一起，外面裹住白桦树皮，长约二尺

五寸，类似箫的大型笛，在鹿交尾期学牡鹿叫声来呼唤牝鹿。”⑦

契丹族由于主事畜牧，客观上就造成了他们“畜牧牧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⑧“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⑨的生活方式和特点。达斡尔族至今仍然保持着这种兼营牧业和狩猎业的生活习惯。解放前，他们的交通运输工具主要依靠勒勒车（俗称“草上飞”），清代学者西清在《黑龙江外记》中记述了这一情景，“勒勒车，牛曳之，一童子尝御三、五辆，载粮草类，然富者乘之，以毡毳为盖，蔽风雪。间亦用桦皮，式如棺，号桦皮车，布特哈多此物。”⑩

生活在我国北方的契丹族，从长期经历冬季寒冷气候的实践中，创造了冬天凿冰捕鱼的方法。辽代皇帝也常常在冬季安“捺钵”（行宫）于达鲁河上，进行“卓帐冰上，凿冰取鱼”。⑪“达鲁河东与海接，岁正月方冻，至四月而泮。其钩是鱼也，虏主（按：辽道宗耶律洪基）与其母皆设帐冰上，先使人于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截鱼，令不得散逸，又从而驱之，使集冰帐。其床前予开冰窍四，名为冰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环之不透，第斫减令薄而已。薄者所以俟鱼，而透者将以施钩也。鱼虽水中之物，若久闭于冰，遇可出水之外，亦必伸首吐气。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鱼，而薄不透水者将以伺视也。鱼之将至，伺者以告虏主，即遂于斫透眼中用绳钩掷之，无不中者。既中，遂纵绳令去，久，鱼倦，即曳绳出之，谓之得头鱼。头鱼既得，遂相与出冰帐于别帐作

乐上寿。”⑫契丹族的这一“凿冰取鱼”之法，被后来的北方各族人民所沿袭，其中尤以达斡尔族人民为最。“冬日，凿冰眼下网，较水面稍难，而得鱼亦多”。⑬孟定恭在《布特哈志略》中叙述的“穿作（凿）冰眼兮，下冬网，持备钩插（叉）兮，捕鱼尾”正是这种“凿冰取鱼”的最好写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虽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粹的民族，但究其源流，终有主次之分，达斡尔族这个元期以后才出现的民族，其源流主要源于契丹是不容质疑的。

注释：

①《达斡尔蒙古考》

②《辽史·地理志》

③刘凤翥《从契丹小字解读探达斡尔为东胡之裔》

④《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概况》

⑤《辽史·国语解》

⑥《辽史拾遗补》卷五引自《人海记》

⑦日本、池尻登《达斡尔族》

⑧⑪《辽史·营卫志》

⑨《魏公集·契丹帐诗》

⑩西清《黑龙江外记》

⑫程大昌《演繁露》

⑬西清《黑龙江外记》卷八

从民俗论达斡尔族源于契丹

近世纪以来，达斡尔族源于契丹说已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学家所证实。这是我国北方民族史研究的新成果。笔者试就民族习俗的传承性和“民族习俗是区别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撰文补充“契丹说”，不当之处，望学者指正。

1、契丹和达斡尔人的生活习惯基本相同

古时，契丹人主事畜牧，客观促成这个民族“畜牧畋渔以食，转徙随时，车马为家”、①“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②的生活方式和特点。契丹人因为调换“畜牧畋渔”场地，需要经常搬迁，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他们学会了制造车辆，每当“随水草迁徙，则有毡车，任载有大车，妇人乘马，亦有小车，富贵者加以华饰。”③

如今的达斡尔族人除了农业之外，仍然继承着他们祖先契丹人遗留下来的畜牧和狩猎业的生产、生活习惯，到民国末期和伪满初期，他们仍然以兽皮裁制衣服，春夏秋三季身穿无毛的袍皮袍哈日密（Haarimi），冬季穿有毛的袍皮袍德力（Deeli），脚穿用狗腿皮缝制的其克密（Qikaa_mii）。尽管很早就已经定居，但是每到夏季青草出来之后，他们就将牲群赶到草原上去牧放。由于北方冬季“四溟

扬白雪，径冷人迹绝”，达斡尔人在契丹人穴居窖子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马架”和修有卐字炕的草房。曾有人写诗描述达斡尔人冬季的生活说：“十月寒威不可挡，烧炕为床火为墙，一壶奶酒新开瓮，更切生鱼和辣尝”虽然他们主食粮食，但是，兽、畜肉始终是每个达斡尔人离不开的食品。

达斡尔族女人不惯骑马，但他们的交通运输工具仍然延袭了契丹人“毡车”的特点，主要依靠勒勒车（以黑桦木制成，俗称大轮车或草上飞）。清代学者西清在《黑龙江外记》中记述了这一情景：“勒勒车，牛曳之，一童子尝御三、五辆，载粮草类，然富者乘之，以毡毳为盖，蔽风雪。间亦用桦皮，式如棺，号桦皮车，布特哈多此物。”④

2、契丹和达斡尔人都有杀马殉葬风俗。

《隋书》、《北史》都记载说契丹风俗与靺鞨相同。⑤而“靺鞨……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杀乘马于尸前设祭”，⑥由此可知契丹人之葬俗。到耶律隆绪（辽圣宗）和耶律宗真（辽兴宗）时期，虽几经下令禁止杀马殉葬，但因此俗已在民间形成根深蒂固，已经无力制止。从辽至民国，达斡尔人一直传承着这一古老风俗。除非正常死亡之外，达斡尔族亡人均行土葬。人死之后，一般都在第四天的上午举行开吊仪式，开吊时，当主祭人读完祭文之后，便将死者生前的坐骑拴挂好鞍辔，拉到灵前祭祀，然后宰杀，名曰“杀马殉葬”，丧主并要用这四匹马的肉去招待亲友，名曰吃“殉马饭”或“告灵饭”。

3、契丹和达斡尔人都行跪拜礼。

《辽海丛书》载：“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动为节数，止于三，彼言捏弛者即跪也。”⑦达斡尔人打千请安时，男人姿势是先将左腿向前迈出半步，然后双手叠放在伸出腿的膝盖上，再弯腰屈膝。女人请安姿势双足并立，双手扶膝，作低头下蹲式。行叩头礼时，男跪女蹲。尽管跪拜形式有别于契丹，但是不难看出这是由于年代久远，使两个民族之间产生了习俗变异，而其跪拜的根本仍然无变。

4、契丹和达斡尔人都信仰萨满教。

契丹人笃信原始的萨满教，认为宇宙间的万物和人生祸福全由鬼神主宰，为此，契丹人在“在氏族中选派自己的代言人——萨满，作为人与鬼神之间进行联络的使者，以求达到消灾求福”。

我国达斡尔人在解放前信仰萨满教，其目的在于为人祭鬼治病。萨满教的活动在汉族人中俗称“跳大神”，从事跳神鬼的人即萨满，达斡尔语称雅达干（Yadgan）。萨满有男有女，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只是在为别人治病时才穿着法衣、法帽，手执法鼓跳神驱鬼，因此，达斡尔人的萨满教未能形成职业性的宗教团体，一直保留着古代契丹时的原始宗教特点。乌居龙藏在他的《满蒙古迹考》中说：“契丹人固有之宗教与其他东北民族同为萨满教”，说明了这两个不同时代民族的宗教信仰有着同源关系。而且达斡尔萨满在跳神驱鬼之前，总是先念一段开场白似的咒语，而咒语的开头几句又总是“西拉木伦”、“喀拉木伦”如何何如。“西

拉木伦”和“喀拉木伦”(即查干木伦)均属河流名称，今为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辖。喀拉木伦河为西拉木伦河的支流，辽时二者统称潢水。《旧唐书》载有：“契丹，居潢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⑧达斡尔萨满跳神用这两条河流名作开场白，包含着有纪念其祖先契丹人生活在潢水地方之意。

5、契丹和达斡尔人都有泼水求雨习惯

每逢久旱不雨，契丹人便泼水祈雨，以求天神降水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辽史》比较详细的记载了契丹人的这种求雨活动，“若旱，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又翼日，植柳天棚之东南，巫以酒醴、黍稷荐植柳，祝之……即三日雨，则赐敌烈麻都马四匹、衣四袭，否则以水沃之”，⑨“五月甲申，以岁旱，泛舟于池祷雨；不雨，舍舟立水中而祷，俄顷乃雨……丙子，射柳祈雨，复以水沃群臣”。⑩到了近代，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唯独达斡尔人还保留着契丹人的这种求雨风俗，达斡尔语称嘎日贝(Caarb)。从前，东、西布特哈的农民，每遇夏季出现大旱时，各村里的妇女便以户为单位，在二神巴格奇(Bagaq)的主持下，带着小鸡和稷子米，聚集到河边的大树下面举行祭祀仪式。求雨祭，只要求少数男人参加，他们的任务只是帮助架设吊锅、筹备烧材和宰杀小鸡。祭祀时，当巴格奇祷告完求雨词之后，男人宰鸡，女人在吊锅里烧煮鸡米混合粥。粥熟，巴格奇再次祷告，妇女们面对河水为河神焚香叩头。礼毕，席地于树下共食鸡肉粥。食罢，妇女拎着自带的盆、桶到河边取水，互相追逐泼洒、嬉戏，直到把每个人都浇透为止。